DOI:10.16600/j.cnki.41-1426/c.2015.02.018

汉简中的大宛和康居*

——丝绸之路与中西交往研究的新资料

郝树声

摘　要：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西北的敦煌悬泉置遗址（北纬40°15′54.22"，东经95°19′45.01"）出土的悬泉汉简中记载了丝绸之路中西交往的盛况。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最先所到之地有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这些地区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和西亚地区的阿富汗、伊朗等国以及南亚次大陆。这块土地曾经是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北方塞人的游牧文化以及贵霜文化的交汇之地。悬泉汉简中关于汉王朝与大宛、康居往来交往的记录为研究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具体生动的新资料。

关键词：汉简；大宛；康居；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5）02-0059-11

张骞通西域，开创了中西官方外交和丝绸之路的先河[①]。张骞最先所到之地有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传闻其旁大国五六”。这些地区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和西亚地区的阿富汗、伊朗等国以及南亚次大陆。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这里曾被强盛一时的波斯帝国统治长达200年之久，后又被亚历山大希腊化，是重要的文化交汇之地。20世纪90年代，在敦煌悬泉置汉晋遗址出土了近20000枚汉代简牍。作为当时中西交通要道上的一处邮驿接待机构，悬泉置留下了大量西域（主要指今天的新疆）以及中亚、西亚、南亚等各国国王、质子、使者、商客等东来朝拜、受封、纳贡、通使、经商、学习，以及中原王朝派往上述各国的使节、商贩经过此地的记录，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的状况提供了新资料。下面就汉简中关于大宛和康居的材料作一分析研究。

一、汉简中的大宛

大宛是两汉时期的中亚古国，所处费尔干纳盆地为大陆性气候，适宜农业耕作。大宛东北至西南约为370千米，南北宽约为200千米，总面积约为7800平方千米。如果把山口以外的苦盏（Khujand）和乌拉秋别（Wulaqiubie）包括在其中，它的疆域面积更大。这一地区现在分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在费尔干纳盆地发现的时代在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7世纪的楚斯特（Chust）文化，调查发掘过80多处遗址，其中发现有原始的灌溉系统和发达的手工业，显示了当时绿洲城

收稿日期：2014-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悬泉汉简整理与研究”（13&ZD08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郝树声，女，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甘肃兰州　730070），主要从事西北史地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

邦国家逐渐形成的过程。其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埃拉坦（Eylatan）②遗址是该时期费尔干纳盆地最大的城堡遗址。公元前3世纪～公元4世纪，有明特佩（Mingtepa）③和阿赫斯克特（Akhsiket）遗址④，以其具有坚固城防的古代城市成为大宛绿洲国家城市遗址的代表⑤。

关于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张骞到来之前大宛的基本状况，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的《中亚文明史》第二卷有这样的描述：

在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和公元第一个世纪内，咸海和锡尔河地区的农业主要在花剌子模和大宛（费尔干纳）这样的独立政权境内发展，尽管它们在短期内部分地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希腊－巴克特利亚人和贵霜人。公元前290—160年期间，苏对沙那与俱战提似乎成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一部分。这些政治变化影响了它们的物质文化。考古发掘显示了苏对沙那、俱战提和费尔干纳西部的希腊成分，俱战提的发掘物清楚地揭示出中亚文化形成中的希腊影响。

公元前160年前后，苏对沙那与俱战提（作者按：即乌拉秋别和苦盏）独立于希腊－巴克特里亚人，而费尔干纳似乎从未隶属于他们，希腊人的控制权似乎从未超越亚历山大曾经征服的范围。然而，斯特拉波的一个注释却导致许多学者认为费尔干纳曾经归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诚然，在此发现了希腊－巴克特里亚君主的钱币，但是这可能只是贸易交往的结果。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月氏部落经过费尔干纳和苏对沙那南下，随后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十分可能的是，幅员辽阔，经济富庶和人口众多的大宛政权便在此同时兴起。[1]365~366

张骞眼中的大宛，中国史籍中如此记载：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拘弥）、于窴。[2]3160

从考古资料和文献的记载看，张骞所看到的大宛，同当时周边的匈奴、康居、大月氏不同，虽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但主体还是农业定居之国，水利灌溉和农业比较发达，除适宜稻麦耕作外，葡萄和葡萄酒是其特产。苜蓿是天然的马嗜之物。畜牧业中的汗血马，曾是汉天子出兵大宛的攫取目标。境内大小城邑七十余座。到后来班固写《汉书》时，这里已有“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3]3894。从人口规模看，仅次于乌孙、康居和大月氏。基层社会以五口之家为单位，老百姓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家出一兵，拥有大约六万人的军队。大宛人的祖先应该属于塞人的一支，所谓“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说明他们统属于印欧语系的伊兰语族；其相貌特征是“皆深目，多须髯”，亦即塞人的特点；“善贾市，争分铢”，说明商业较发达，生活中的日常需要得靠商贸交换来满足；“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这正是希腊文化的影响。

张骞到大宛，沟通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大规模交往，但汉王朝与大宛关系进入实质性交往阶段则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得知大宛有汗血马，汉武帝便心有惦记，于是想派使者以财帛换取金马。可大宛以为汉廷遥远，路途艰险，不仅不答应使者的要求，还杀了汉使，掠了财物。被激怒的汉武帝立即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历四年之久，捐十几万将士之躯，最后借大宛贵族之手杀了国王毋寡，订了城下之盟，获天马数十匹，中马三千余。随后，又跟即任国王蝉封订立盟约，“质子来汉，岁献天马二匹”。

大宛之战，威震西域，确立了汉帝国在西域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大国地位，“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再加上在此之前张骞出使乌孙时派往

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拘弥)及诸旁国的副使亦同出使国的使者一同回到汉朝,从而开启了两汉时期中西交通的繁盛局面。史书记载:

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2]3170

…………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欢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𩾐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2]3172

自此以后的一百多年中,汉与大宛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甚至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后汉王朝所辖西域诸国中,大宛也是其中之一。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关于大宛来汉的汉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汉王朝与大宛关系的档案记录。

简一:

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奴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Ⅱ90DXT0115④:37)

木简,长23厘米、宽1.3厘米,柽柳,存字52。这是御史大夫田广明下发给朝廷使者的传信,持信人路过悬泉置的抄件。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为公元前74年12月28日。从右扶风到敦煌,“以次为驾,当舍传舍”。简上的年月日是开具传信的时间,至于何时路过悬泉置,不得而知。“乘传”为驾四马的传车,朝廷官员出使,都要坐这种规格的车子。

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田广明任御史大夫在元平元年至本始二年(公元前74年~公元前72年),其上任是蔡义,下任是魏相。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驾崩,先立昌邑王贺,后立武帝曾孙病已,是为宣帝。当时虽霍光秉政,朝政动荡,但汉与西域尤其是同大宛的关系尚处正常状态。

天马,先指渥洼水中所得神马,后指乌孙马。李广利伐大宛后专指大宛汗血马。《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贰师既斩宛王,更立贵人素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后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谄,使我国遇屠,相与共杀昧蔡,立毋寡弟蝉封为王。遣子入侍,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镇抚之。又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谕以伐宛之威。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3]3895

此简有纪年,时在元平元年,距李广利伐大宛,已过26年。在这20多年中,大宛“岁献天马二匹”的约定在一直践行中,简文内容与此有关,说明李广利伐大宛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汉与大宛始终保持了贡使来往关系。另外,简中所记内容说明,每年迎取天马,朝廷要派人赶到敦煌郡,从敦煌郡迎接贡使和天马再到京师长安,沿途所过,要提供车驾和食宿安排,表明汉朝廷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简二:

以食使大宛车骑将军长史。(Ⅰ90DXT0112③:30)

柹片,长5厘米、宽0.6厘米,存字11。出土该柹片的探方层位中,有15枚纪年简,其中14枚是宣帝时期的。从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到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六个年号连续出现,所以该简内容反映的史实当为宣帝时期。

这是一份悬泉置接待过往官员和使者的记录,内容是朝廷派车骑将军长史出使大宛,路过悬泉置时悬泉置为之提供了膳食。

车骑将军不常置。宣帝时任车骑将军者有张安世、韩增、许延寿和乐陵侯史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元平元年,右将军张安世为车骑将军、光禄勋。地节三年(公元

前67年)四月戊申,车骑将军、光禄勋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七月戊申更为大司马卫将军。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前将军韩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韩增薨,强弩将军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延寿薨。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二月,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可见,从公元前74年到公元前67年,车骑将军为张安世;公元前67年到公元前62年,空缺;公元前61年到公元前53年,先后是韩增和许延寿,公元前53年到公元前49年,空缺;公元前49年后是刘史高。除张安世之外,其他三位都是以大司马兼领车骑将军。张安世在最后一年亦如此。所以简中只记"车骑将军"而未冠"大司马"字样,说明简文所记"车骑将军",当指张安世。

《汉书·冯奉世传》记载:"先是时,汉数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称,或贪污,为外国所苦。是时乌孙大有击匈奴之功,而西域诸国新辑,汉方善遇,欲以安之,选可使外国者。前将军增举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奉世与其副严昌……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宣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此事,《资治通鉴》系之于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冯奉世出使大宛之前,汉朝曾多次派使节出使西域及大宛各国,只是"多辱命不称"或"为外国所苦"。上述简文印证了这一事实。

简三:

使大宛车骑将军长史尊使□候张

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Ⅱ90DXT0314②:121)

木牍,残长9.8厘米、宽1.8厘米,柽柳,下部和左侧残,可释者只有两段残文,24字。是一份使大宛车骑将军长史尊和□候张某等人所持传信,字迹比较潦草,显为路过悬泉置时抄录登记的内容,而非原件。第二行"行在所"之前当有"诣"字,可见出使已经结束,这是返回朝廷途经悬泉置的记录。"为驾一乘传"之后,按此类文件格式,当有"当舍传舍,如律令"的套语。

出土该简的地层中共出纪年简主要为宣、元、成三朝的年号,最早为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最晚为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但是前文说过,自张安世之后,车骑将军一职均由大司马兼任,位居三公。该简只提车骑将军而未冠"大司马"者,亦当在张安世任车骑将军时期,即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到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之间。

此两简都是汉朝使者出使大宛的记载,说明当时汉朝对与大宛的外交关系极为重视,使节来往频繁,关注度极高。

简四:

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Ⅰ91DXT0309③:97)

木简,长23.2厘米、宽0.8厘米,柽柳,存字28,有一字不清。内容为接待西域诸国使者的记录。同层所出纪年简61枚,除昭帝元平元年1枚外,其余都属宣帝时期。其中元康8枚,神爵47枚,五凤5枚。所以此简当为宣帝时期之物。简中有西域八国使者18人,贵人若干人。而八国之中,大月氏和大宛远在中亚,其余六国均为丝路南道城郭诸国。六国中,疏勒、于阗、莎车、扜弥,有15000~20000人口,而渠勒和精绝只有2000~3000人。从东到西,有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莎车、疏勒,再加上大月氏和大宛这两个葱岭以西大国,路途更加遥远。八国使者从不同的地方不期而遇,同时路过悬泉置,不仅说明上述各国同中原汉朝关系友好,而且也说明当时丝绸之路盛况空前。"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4]2931,言之不虚。

简五：

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泉置。（Ⅱ90DXT0214②:53)

木简，长20.3厘米、宽0.9厘米，柽柳，下部残断，但文字完整，存字24。从正规的隶书字体和内容看，此简当为悬泉置向上级汇报的一份正式报告。大宛贵人向朝廷贡献的骆驼死在了悬泉置，当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死因如何，责任在谁？要逐级上报。简文上下当有其他内容，此简只是其中之一。同层所出纪年简97枚，最早者为神爵年间（公元前61年～公元前58年）简，自神爵后到西汉末年的年号，几乎是连续的。所以此简的年代最早在神爵年间，下限不可知，自然可判为宣帝以后之物。此简说明，自宣帝以后，大宛给汉朝的贡献不仅有天马，还有骆驼。这一峰死在悬泉置的骆驼随贵人而来，当然不是一般的商贸行为和交换之物。

简六：

酉使送大宛□

□收责过所趣遣（Ⅱ90DXT0113②:88）

木简，长4.5厘米、宽1.1厘米，松木，上下部残断，存字两行，左行存字5，右行存字6。第一行当为年月日干支，“使送大宛”使者某人到某地，乘何等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之类，第二行文意不明。但从仅有的文字信息看，仍可判定为朝廷派人送大宛使者路过悬泉置的记录，与大宛和汉朝的来往有关。出土此简的地层，最早的纪年简是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此后至西汉末年的纪年简都有，只能说此简内容是宣帝以后之物，同样反映的是宣帝以后大宛与汉朝的关系，至于下限则难以判断。

简七：

大宛贵人食七十一

凡三百一十八人（Ⅴ92DXT1311③:216)

木牍，长10厘米、宽1.2厘米，松木，左、右两侧和下半部分均残缺，存字两行，15字。左、右两侧应当还有文字，不得而知。其内容仍然是西域贵人、使者路过悬泉置时为之提供膳食的记录。大宛贵人之外，当有其他西域诸国的贵人和使者，惜已残缺。悬泉汉简记载人数，往往以人次相加。如果是106人三食，亦可作食318人；如果是53人食六食，亦可作食318人。所以简中三百一十八人，不能直接理解为一次就接待了如此之多的客人。当然，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自汉武帝伐大宛后，“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如此看来，西域诸国一次来数百人，也是正常的。

出土该简的地层中共出纪年简45枚，其中甘露3枚、黄龙2枚、初元35枚、永光5枚，所以该简当为宣、元时期之物，内容反映该时期大宛及其西域诸国同汉朝的关系。

简八：

使大宛卫候建叩头叩头（Ⅱ90DXT0216②:193）

木牍，长12.2厘米、宽1.1厘米，松木。左右两侧和下部残，存字10，而前5字仅存右半，释文是根据字形判读的。木牍两侧和下半部分当有其他内容。书体用规整的八分隶写成。从内容和语气看，当是出使大宛的卫候给朝廷的上书。

出土该木牍的地层共出纪年简147枚，除有宣帝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公元前50年）的2枚外，都是元、成时期的。其中永光、建昭年间（公元前43年～公元前34年）共125枚，时间最晚的1枚在鸿嘉五年（即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的1枚。所以该木牍的时代当在元、成时期，其反映的内容当为元、成时期大宛与汉朝的来往关系。

《汉书》记载，以卫候出使大宛者只有冯奉世，时在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简中的“卫候建”可能是冯奉世之后又一次以“卫候”身份出使大宛的汉朝使节。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矫诏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和城郭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两路西进康居，消灭北匈奴郅支单于，成为汉匈关系史上的大事，也是西域史上的大事。当时能够调发

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不过两千多人),说明汉朝对西域诸国的管理已相当有效。当时三校军队西越葱岭经大宛到康居,三校军队经温宿(即今阿克苏)越天山,从北道入赤谷城过乌孙,涉康居界,至滇池(伊塞克湖)西。前者过大宛,似应得到大宛的欢迎和支持。从该简的记载看,永光、建昭年间,大宛和汉朝的关系是友好的。

简九:

居大宛北道　　城

伏地(Ⅵ92DXT1122③:9)

木牍,长10.4厘米、宽3.7厘米,松木,上下残甚,能释者不过数字。从语气和行文看,当为一封书信的内容,与出使大宛有关。与该木牍同层共出的纪年简11枚,都是元帝时期的,其中初元年间7枚,永光年间4枚。所以该木牍内容当为元帝(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在位)及其前后的记载。

简十:

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赵平送自来大莞使者侯陵奉献,诣在所以(Ⅱ90DXT0114④:57)

木简,长18.8厘米、宽1.3厘米,松木,下部残断,存字29。悬泉置过往接待记录,有明确纪年。建平五年即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十一月丙申朔,庚申为二十五日。公元前2年12月21日。卒史是太守府的文职官员,受过正规教育,至少通一经,秩百石。三辅各郡卒史有秩二百石者。简中"卒史赵平",是敦煌太守下属的官员,因为所谓"送",乃送往京师。莞、宛相通。全文意思是:大宛使者侯陵,要到京师朝贡,是大宛自己所派,非汉朝邀请。路过悬泉置的时间是公元前2年12月21日。

此时汉室衰微,董贤用事,哀帝昏弱,外戚专权,朝政一片黑暗。但是周边国家包括匈奴、乌孙以及西域诸国由于长期的经营管理,此时正处于效益期和收获期,然而"思汉威德,咸乐内属",这说明汉朝的向心力和内聚力并未减弱,"匈奴单于及乌孙大昆弥伊秩靡皆来朝,汉以为荣。是时西域凡五十国,自译长至将、相、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5]1123。大宛是西域都护府管辖的国家,当在佩带汉印之列。简文所见,就是大宛自来朝贡的事例。

上引10条汉简,并非汉与大宛关系的全部,以斑窥豹非全豹也。但是,它从出土文献的角度足可证明,李广利伐大宛后的一百年里,汉帝国与远在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大宛国始终保持着频繁而亲密的来往关系。

二、汉简中的康居

康居是紧邻大宛西北、分布在锡尔河北岸、哈萨克斯坦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其势力繁盛时可能达到泽拉夫善河流域(今布哈拉河)。至于其族源,至今尚不清楚,"古代的波斯记载和希腊史家都忽略了他们"[6]43。唯一留下来的史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2004年7月,哈萨克斯坦考古人员曾在南哈萨克斯坦州首府希姆肯特市以西25公里处,发现一处保存完好的康居国将军墓。这是哈学者在对康居古国20多年的考古调查中首次发现的未经盗掘破坏的康居古墓[7]。2006年10月,在南哈萨克斯坦州奥尔达巴辛区库尔托别遗址发现了刻在黏土砖上的古康居国文献,仅6行44字,主要信息是:古代康居国时期布拉哈绿洲的首府是诺沃阿克梅坦,意即"新居处"。文献中提到的一些古老的城市,如恰奇、纳赫沙布、撒马尔罕和克什,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8]。其他一些墓葬因被盗掘破坏而基本失去了研究价值。张骞在公元前2世纪到来时,这里已俨然大国。后来《汉书》记载,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其人口、户数、胜兵正好相当于大宛的两倍。

康居与汉朝的关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张骞初次来此,曾得到康居的友好款待。"康居传致大月氏",就是派车把张骞送到大月

氏。其后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 ~ 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康居怕唇亡而齿寒,曾为大宛后援。北匈奴郅支单于西逃塔拉斯河(今江布尔州),康居曾与之结盟,互为翁婿。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陈汤伐郅支,康居又暗地里支持郅支。成帝时,西域都护郭舜有一个上奏:

> 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不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9]6247

但是,朝廷并未采纳郭舜的意见,"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主要是公元前半个世纪汉与康居关系的记录,反映的就是这种"羁縻而未绝"的情况:

简一:

>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Ⅱ90DXT0213③:6+T0214③:83)

这是一件完整的木牍,长23厘米、宽2.8厘米,松木,存字100。背面还有49字,其内容与正面不同,不赘引。这块木牍出土时断成两片,散落在不同的探方里,后来整理时才发现两者可以缀合在一起。这是敦煌太守府发往酒泉太守府的平行文书,是悬泉汉简中较早记载汉朝与康居来往的纪年简。这次康居王所派使团从使者、贵人到从者,一共76人,随行大牲畜78头。这在当时中西交通的大道上不能不说是一支浩大的队伍。要接待这样一支庞大的使团,沿途如敦煌、酒泉等地的地方官员必须认真办理,否则要受到朝廷的追责。因此敦煌太守提前移书酒泉太守,要其做好接待准备。同样,按照常规,酒泉太守也要移书张掖,以次类推。从简文记载看,除了沿途地方官必须出面接待外,西域都护府的最高长官还要派专人把他们陪护到京师。此时的西域都护是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军候丞赵千秋,就是奉都护之命陪同康居客人的。军候相当于比六百石官员,同驻扎在河西边防的候官同秩。丞是军候的属吏,官阶不高,而且是"罢军候丞"。"罢"者,更尽回返。按照西汉的兵役制度,戍边的戍卒一年一更,官员三年一更。赵千秋属于军官戍边,可能早在五凤三年就到了西域的戍所。此次更尽回返,顺便受都护指派,陪同康居使团到京师长安。再有,康居使团所带78头大牲畜中,有贡献的马匹和骆驼若干,有私马、驴、驼、牛若干,前者是给朝廷的贡献之物,后者可能是使团人员自己的乘驾。至于牛,或可为沿途遇到困难时,以供宰杀食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给朝廷的贡献。从这条简文看,至迟在宣帝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 ~ 公元前50年),康居与汉朝就有了贡使关系,所以《汉书·西域传》载:"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显然不准确。如果我们编写丝绸之路编年史或者汉朝与康居的交往史,公元前53年3月6日,有76人的康居使团带着78头牛马、骆驼等贡物浩浩荡荡开进玉门关并得到沿途官员的热情接待,不能不说这的确是一件需要特别记述的事。

简二:

> □送康居诸国客卫候臣弘副□池阳令臣忠上书一封　黄龙元年(Ⅱ90DXT0214③:109)

简三:

> 黄龙元年六月壬申使主客给事中侍谒者臣□
>
> 制诏侍御史曰使送康居诸国客卫候盖与副□
>
> 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Ⅱ90DXT0114④:277)

简二残长18.7厘米、宽1.3厘米，柽柳，存字26，可释者24字，有纪年。简三残长8.5厘米、宽1厘米，柽柳。按正常尺寸，下半部尚有大约14.5厘米缺失。存字三行，可释者46字。虽属残简，但内容尚可研读，亦有准确纪年。

以上两简，都有纪年。黄龙元年，即公元前49年，是汉宣帝最后一个年号，只用过一年。前简未记日月干支，不知具体时日。简中使送康居诸国客的卫候，卫尉的属吏，大概为六百石或者比六百石秩级的官员。《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条下有："又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皆属焉。"《元帝纪》师古注曰："卫尉有八屯，卫候、司马主卫士徼巡宿卫。"冯奉世在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出使大宛时，就是以卫候身份奉使的。池阳，汉县，治今陕西泾阳县北。池阳令在此上书，可能是临时奉使。卫候臣弘和池阳令臣忠一起上书，不知在护送康居诸国客的过程中发生了何事？至于护送了多少人，除康居客人外还有哪些国家的？简文残断，尚不得而知。但仅从残断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康居与汉朝在当时的来往情况。

简三有月日干支，六月壬申，初二日，公元前49年7月12日。简文是一封以制诏形式传达的诏书内容。简中"主客给事中侍谒者"尚不知是一个官衔还是两个官衔？《汉旧仪》有"主客尚书主外国事"，顾名思义，"主客给事中"亦即主办外交事务的给事中。《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侍谒者"亦皇帝身边近臣，《史记·滑稽列传》载："（东方）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汉书·韩延寿传》载："延寿代萧望之为左冯翊，而望之迁御史大夫。侍谒者福为望之道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综合起来看，简中"主客给事中侍谒者"当解释作一个职衔较为合适。上两简中，朝廷派出护送康居等外国客人的官员都是卫候，前者是卫候弘，后者是卫候盖，可见两简所记之事虽都发生在同一年，但分别是两件事，而非一事。后简第三栏的内容，类似常规的传信，即要求各地为之提供车马住宿。

以上两简分别记载了黄龙元年朝廷派官员护送康居王使者路过敦煌悬泉置的史实，是汉朝与中亚地区以及康居诸国关系的原始记录。

简四至简十：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䪥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简四]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官大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道不得[简五]食，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简六]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简七]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汉侍郎当，移敦煌大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简八]

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　王使者杨伯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简九]

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掾宗、啬夫辅。[简十]（Ⅱ90DXT0216②877-883）

总共7简，连缀为一个册子，出土时编绳尚存。长度均在23厘米左右，前4简各宽1厘米，后3简统宽1.5厘米，中间成脊形，俗称两行。两种不同形状的简编为一册。木质为柽柳。

全简293字，内容可分为四部分，主要记录康居王使者和苏䪥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的事情。

前4简为第一部分，143字，叙述康居使者及贵人到敦煌入关后，一般要对贡品即奉献的

骆驼进行评估，评估内容涉及牝牡、毛色、肥瘦、口齿、价值等等。对方当事人5人：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苏𩓥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囷、贵人为匿。他们此次来奉献骆驼不是第一次，而此前曾有过多次，他们每次从敦煌入关东往酒泉，沿途食宿要有人解决，到酒泉后，太守及下属官员要会同朝贡者一起对贡物进行评估。（至于评估后交由郡县上转，抑或继续由朝贡者带往京师，尚不得而知。）而此次的情况不同了。第一，他们入关后，从敦煌到酒泉，一路缺乏食物供应；第二，到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其奉献的骆驼进行评估时没有让当事人杨伯刀等人现场参加，单方面作出了评价；第三，评价的结果有问题，杨伯刀带来的骆驼本来是膘肥体壮，可酒泉太守及其下属却定为羸瘦；第四，姑墨奉献三匹白骆驼，一牡二牝，可酒泉方面却定为“黄”，“不如实，冤”。因而上告到朝廷的有关衙门。

第二部分1简41字，乃永光五年六月初一日（公元前39年7月21日），朝廷主管对外交往和蛮夷事务的使主客谏大夫行文敦煌，要求敦煌太守接到文件后对此进行查询并按时上报中央，不得留迟。

第三部分1简62字，永光五年七月庚申（七月十八日，公元前39年9月6日），敦煌大守弘、长史章以及兼行丞事的守部候修仁联署文件，下发效谷县，要求县廷接到文件后，将康居王使者路过县境时为之提供的谷物数量在七天之内，于本月二十五日上报太守府。后面有发文时掾、属、书佐的具名。从京师行文到敦煌，中间相隔48天。

第四部分1简47字，永光五年七月壬戌（七月二十日，公元前39年9月8日），效谷守长合宗、守丞忠（时为敦煌左尉）联署文件，下发悬泉置，要求在三天之内，于本月二十三日将传马食谷情况上报县廷。最后是掾、啬夫的具名。

简文中的当事人除康居使者外，还有苏𩓥王使者。苏𩓥王地在何处，牵扯到康居五小王的具体位置。《汉书·西域传》载：“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苏𩓥王，治苏𩓥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迄今为止，确指康居五小王具体位置者，唯《新唐书·西域传》，具体记载如下：

苏𩓥城：“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𩓥城故地。”[9]6247 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卡什卡塔尔里亚省的沙赫里夏波兹（Shahrisabz）。中心在北纬 39°03′，东经66°49′左右。

附墨城：“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9]6247 唐朝的何国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中心在北纬40°5′，东经65°22′。西南距布哈拉100千米，东南距撒马尔汗80千米。

窳匿城：“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圆千余里，右涯素叶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药杀水，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东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战，多良马。”[9]6247 唐朝石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就是说，康居小王窳匿城即在今天的塔什干附近。

罽城：“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9]6247 唐朝安国都城阿滥谧城，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

奥鞬城：“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戊地，西南与波斯接，抵突厥曷萨，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9]6247 唐朝的火寻国，都城急多飕遮城，具体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西部阿姆河下游花拉子模州

首府乌尔根奇(Urgench)附近。余太山认为,奥鞬即喝汗,即东安[10]134。其地在那密水之阳。备一说。

康居是游牧行国,“与大月氏同俗”,活动范围主要在锡尔河以北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草原。但上述五小王的位置除窳匿王在塔什干一带外,其余四地均在乌兹别克斯坦泽拉夫善河(今布哈拉河)流域索格底亚那(Sogdiana),这里是粟特人的发祥地,属于农耕定居之地。因此,有人认为《新唐书·西域传》中关于康居五小王的具体位置靠不住,理由是“由汉迄于唐代,其间相距过长,故对于该地种种情形所报告之来源,殊难信任。吾人亦只能断定若辈之确认显为杜撰及幻想耳”[11]20。但平心而论,唐人去汉数百年,固然“相距过长”,但我们今天去唐一千多年,较之唐人,远之又甚。再说在中国历史上,巴尔喀什湖以西到咸海地区,再沿阿姆河上溯南到阿富汗北部,曾经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统治范围。当时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遗迹遗物以及文物典籍必定比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多得多。当时的文人学者来此观光游历,也比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多得多。所以欧阳修等人修《新唐书》必定参照了上述材料和见闻,他们比定的这些地点,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凿证据之前,不能指为无稽之谈。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当时的康居虽然主体上属于游牧行国,但在一度繁盛之时,曾经征服了泽拉夫善河流域的城郭定居部落。上述五小王就是类似情况。他们虽然自己有国王,并能独立地对外交往,正如汉简中康居王与苏䪥王使者同时来汉朝贡。但他们又附属于康居大国。在康居这个以游牧为主的政权之内,包纳了索格底亚那的定居部落。所以五小王分布在上述地区,并不难理解。

此外,简文记载的是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之事,其中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一是说康居王、苏䪥王使者“前数为王奉献橐佗”,二是说“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至少说明不光汉宣帝时期,正如简一至简三所呈现那样,康居和汉帝国保持了大规模交流交往的关系,而且到元帝永光年间,仍然保持着频繁来往。这就是简四至简十这份2000多年之前的完整简册给我们提供的主要信息。

简十一:

> 阳朔二年四月辛丑朔,甲子,京兆尹信、丞义下左将军、使送康居校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四月丙寅,左将军丹下大鸿胪、敦煌大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⑥

简形两行。长23.5厘米、宽2.4厘米,存字65,内容是一份逐级下达公文的批转文字。“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是当时公文传达的惯用语。阳朔二年为公元前23年,四月辛丑朔,甲子为二十四日,阳历6月18日。丙寅为后两日,四月二十六日,6月20日。具体内容是:公元前23年6月18日,有一封朝廷公文,先由京兆尹信、丞义下达左将军和使康居校尉。6月20日,又由左将军下达给大鸿胪和敦煌太守。公文什么内容,不得而知。此件只是一个下达文件的运行过程。

简文中“京兆尹信”指逢信。此人在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由弘农太守调任京兆尹,任期三年后升任太仆,在太仆任上六年,转任卫尉。由于跟翟方进争夺御史大夫一职,被得手后的翟方进劾罢免官,时在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能查到的为官履历有十一年,在担任弘农太守及其以前的情况不得而知。

左将军丹,即史丹。此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武帝时期的史良娣,宣帝的生母。史丹的祖父史恭就是史良娣之兄。史丹之父史高即史良娣之甥。宣帝驾崩时史高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又在元帝即位后辅政五年。由于这种特殊的渊源关系,史丹早在元帝做太子时(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就以中庶子,侍从多年。元帝即位(公元前48年),又改任驸马都尉,“出常骖乘,甚有宠。”成帝即位(公元前32年),又为长乐卫尉。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为右将军,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迁左将军,在左将军任上十三年而薨(公元前14年),前后在朝半个多世纪。阳朔二年(公元前23

年),正是史丹在左将军任上。简中提到的大鸿胪,名勋,阳朔二年至四年(公元前23年 ~ 公元前21年)在位。敦煌太守为贤,河平元年至阳朔二年(公元前28年 ~ 公元前23年)在任。简文中明言,文件在下达给左将军的同时也下达给了“使送康居校尉”。那么此时的“使送康居校尉”究在路途抑或在京师,不得而知。但不言自明的是,这条简文留下了成帝时期(公元前32年 ~ 公元前7年)汉朝与康居关系的真实记录。

上引11条汉简,是公元前半个世纪里宣、元、成三朝与西域康居等国来往关系的记录,为研究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原始资料。

结　语

公元前后几个世纪的大宛、康居,包括了今天阿姆河、锡尔河之间、费尔干纳盆地以及哈萨克斯坦南部草原的辽阔土地,是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此外,汉简中记载的大月氏,主要反映两千多年前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南部以及阿富汗一带与汉朝的来往关系;汉简中记载的罽宾等地,主要反映印度西北以及克什米尔等南亚次大陆同汉王朝的来往关系;汉简中记载的乌弋山离,主要反映阿富汗西部和伊朗东部地区同汉王朝的来往关系。当时的这些地区,是民族、人种、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历史舞台。波斯文化、希腊文化、本地农耕文化以及北方塞人的游牧文化,都曾在这里发生深刻影响。丝绸之路的开通,把东西方连接在一起,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敦煌悬泉置出土的这些汉简,对研究上述历史弥足珍贵。

注释

①在此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民间来往和转手贸易早已存在。②该遗址位于安集延北部的哈库拉巴德(Hakkulabad)东部埃拉坦村附近。③位于安集延省马哈马特东郊。④位于纳曼干西南25千米。⑤郭物《费尔干纳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网:http://www.kaogu.cn/html/cn/xueshuyanjiu/yanjiuxinlun/bianjiangjizhongwai/2013/1025/33499.html ⑥原简藏敦煌市博物馆,简影见杨永生主编《酒泉宝鉴》,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参考文献

[1][匈]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M].徐文堪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美]麦高文.中亚古国史[M].章巽,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7]陈俊锋.哈考古学家发现古康居国将军墓[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7/19/content_489835.htm.

[8]魏良磊.哈萨克斯坦发现刻在黏土砖上的古康居国文献[EB/OL].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6-10/13/content_5197426.htm.

[9]〔宋〕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日]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M].傅勤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责任编辑/原　孟]